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姜婷婷, 孙晓光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明朝中后期, 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 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 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 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 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 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 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 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 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 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 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 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 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 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 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 明中后期; 琉球商人; 白银内流; 东亚白银货币圈; 中琉关系

中图分类号: K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23) 01-0064-07

The role of Ryukyu Merchants in the Inward Flow of Overseas Sil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SUN Xiao-guang, LOU Ting-t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 large amount of overseas silver poured into the Asian market as a trading currency and flowed into China with product exchange. The silver monetary circle in East Asia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is currency circle, Ryukyu, relying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trade for a long time, actively carried out intermediary trade in East Asian waters. While promoting commodity exchange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 Ryukyu also participated in East Asian silver trade activities, which promoted the inflow of overseas silver into China. In the early 16th century, Ryukyu established trade ties with Manila, the Philippines, Ryukyu merchants not only brough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specialties to trade with them through the navigation route from Fuzhou to Mindanao to Manila, but also took part in the trade of American silver, becoming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Manila to import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In 1609s, Samoan invaded Ryukyu, Japanese officials ordered Ryukyu merchants to go to China to buy raw silk with Japanese silver, which opened the curtain of Japanese silver trade in Ryukyu. Since then, Ryukyu mercha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flow of Japanese silver into China.

Key words: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Ryukyu merchants; silver influx; silver currency circle in East Asia; Sino Ryukyu relations

早在明朝, 琉球所开展的中介贸易已在东亚海域的经贸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琉球商人的足迹遍布中国、日本、东南亚等东亚各国。与此同时 16 世

纪末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的相继大规模开采和中国对白银的强烈追求为琉球商人中介贸易的扩展提供了机遇。自明朝中叶以来, 中国向外吸收白银的能

收稿日期: 2022-04-12

基金项目: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项目“琉球‘儒家文化’认同的历史演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1RXTD004);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人文视域下琉球王国的儒家文化认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CSTJ11)。

作者简介: 姜婷婷 (1998—), 女, 山东泰安人, 曲阜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东亚海域史。

力日益加强, 亚洲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明代中国凭借自身强大的商品竞争力在当时世界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贸易顺差, 大量商品的出口带来了众多海外白银的涌入。欧洲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满足本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要只能不断花费白银购买, 这又间接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白银开采。出于政治因素和地理因素, 当时所开采且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有两个产地: 美洲银矿和日本银矿。美洲白银的一部分经由西班牙人带往在亚洲的殖民据点——菲律宾马尼拉再流入中国, 而日本白银则是通过前往日本贸易的欧洲人以及中国商人带往中国。在亚洲范围内的白银流动席卷了各国, 作为已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琉球更是作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强势登入亚洲的白银贸易之中。琉球商人凭借着自身已有的海上贸易条件在东亚海域中从事中介贸易, 进行中国与菲律宾马尼拉以及中国和日本产品交换的同时, 也加入到海外白银贸易之中, 使部分域外白银注入中国。“以往关于白银流动的解释集中在运输的途径上, 这些解释很少涉及在白银流通圈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亚洲商人群体和其他商人群体的作用”,^{[1](P57)}这其中对琉球商人群体的作用论述更是少之又少。因此, 本文以此为主题, 将琉球商人的经贸活动置于亚洲白银流动的历史图景之下, 系统探讨琉球商人在明中后期白银内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琉球商人的中介贸易

琉球四面环海, 优良港口众多, 有着与生俱来的海上贸易优势。自琉球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向中国上表贡方物之后, 便受到了明朝的大力扶植。明政府不仅在政策上给予琉球以优惠即规定关于琉球国进出口货物免税且回赐琉球丰厚物品, 而且在造船航海技术上也给予大力支持, 同时赐精通航海的闽人三十六姓以发展琉球的航运事业,^[2]在明朝的帮助下琉球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长距离航海贸易的条件。明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实行至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中国海商的衰落则为琉球海外贸易的扩大减轻了外来的竞争压力。不仅如此, 琉球国本身贫乏的物质资源也迫使琉球向海外谋取发展, 这便导致了琉球不能完全依靠本国商品作为贸易交换的对象而需借助一定外物来充实对外贸易资本。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琉球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政策, 积极进行中介贸易以促进本国的发展, 琉球中介贸易主要指琉球将自己作为国与国之间商品的中转站而从事东亚国家之间商品

交换的贸易活动。^[3]从此, 琉球人走向大海, 开始在南海、东海等海域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中介贸易, 琉球商人中介贸易的活动范围遍布东亚各国。在中介贸易开展下, 琉球商人进行各国之间产品交换, 促进了东亚经贸活动的运行。例如在与中国贸易时, 琉球除了将本国产品带往中国, 其贡品也包含大量外国产品。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琉球国的贡品中便有苏木、胡椒等属于东南亚国家特产。^{[4](P38)}除了东南亚特产, 琉球商人也贩卖日本特产来到中国, 万历四十年(1612年), 琉球朝贡的货物中就有“所贡盔甲等亦系倭物”。^{[5](卷501)}综上可知琉球商人所开展的中介贸易使得东亚各国的产品得到了交换, 带动了东亚商贸活动的发展, 但琉球商人对东亚经济所起的作用远不仅如此。

在琉球中介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 16世纪末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采以及相继流入东亚经贸活动之中的情形为琉球中介贸易的扩展提供了机遇。琉球商人因此在进行产品交换的同时, 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之中从而使得琉球商人的中介贸易范围得以扩大。琉球商人之所以能够加入到当时的白银贸易中, 绝不是历史的偶而是必然, 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商人的逐利天性。中国商品在海外价格高昂, 以生丝贩卖为例, 生丝以原产地价格为基准, 在日本市场的价格为原价的1.85倍, 在菲律宾的价格则为原价的3倍。^{[6](P33)}由此可知, 琉球商人将生丝贩卖到海外, 从中可以得到远超成本数倍的利润同时将所得白银的一部分再次用来购买中国生丝, 如此循环往复, 琉球商人所得财富更是不计其数。

第二, 长期以来的对外贸易基础。琉球自加入中国朝贡体系之后, 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并与东南亚各国也有经贸往来。这不仅使得琉球可以获得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特产用来前往马尼拉进行贸易, 而且也能够保证所得马尼拉美洲白银能够再次用来购买中国产品。第三, 琉球与日本的特殊关系。1609年萨摩藩侵扰琉球之后, 琉球的朝贡贸易实质上被日本控制, 日本官方将一部分日本白银交付琉球, 命其购买中国产品, 这样日本白银便经由琉球商人之手流入中国。在东亚经贸往来中, 琉球商人无论因私或因公都无法规避白银贸易, 从此, 琉球商人积极在东亚白银流动之中发挥作用, 从而带动部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

琉球商人在从事中介贸易之时, 顺应了海外白银涌入中国的历史大趋势, 积极融入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 琉球商人群体也因此被纳入到了一个新的

东亚白银货币圈之中。在白银货币圈内部,琉球商人在原有中介贸易基础之上贸易活动的范围得以扩大,其贸易的商品种类以及自身在东亚经贸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得到扩展。琉球商人、中国商人和其他西方人一起推动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和日本本土白银流入中国,从而带动东亚白银货币圈的流动与运行。

二、琉球商人的中菲贸易与马尼拉美洲白银内流

琉球商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活动将部分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和中国商品联系起来,在这个结果下,马尼拉得到了中国特产,中国则获得了美洲白银。由于中国商品对欧洲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为了更多地获取用来购买中国产品的白银,西班牙人加紧了对西属美洲殖民地银矿的开采工作。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银矿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安第斯山脉区域,其中秘鲁的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最为丰富。但起初由于技术的落后,西班牙殖民者开采银矿的进展并不顺利。以秘鲁银矿的白银产量为例,“1556—1557年,产量在520万比索;1562—1565年,产量在800万比索;1567—1570年,产量在770万比索”,^[7]可见此时白银的产量较低且有下滑的趋势。然而1571年秘鲁波托西银矿在生产中使用了汞合金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从银矿石中提取白银的效率大幅度增加,银矿石利用率的提高使得白银产量迅速增加,“1571—1575年白银产量为21.6百万比索,1576—1580年产量为44.4百万比索,1581—1585年产量为49百万比索”。^{[8](P23)}16世纪末美洲白银数量激增为大批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提供了前提,美洲白银运往亚洲的渠道有多条,其中一条便是经由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美洲白银运至其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再借由大帆船运至中国。西班牙人为了大量购买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将美洲白银运往其在亚洲的殖民地马尼拉,在那里西班牙人与前往贸易的商人进行产品交换,白银也就顺势流入中国。值得注意的一点,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署的《托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了两国在世界的势力范围,依据约定,亚洲被划归为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也就因此西班牙无力插手亚洲事务,这影响了西班牙人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面对这一窘境,为了更好用白银来交换中国商品,西班牙人于是在殖民地马尼拉招募中国商人参与贸易,借此方式得到所需产品,而在这种情势下,琉球商人也参加进来,用生丝来交换白银。^{[1](P98)}

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官方文书中曾多次提及琉球的相关情况与琉球商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活动,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琉球群岛的名称以及地理位置,并间接描述了西班牙试图对琉球进行征服。在1573年西班牙殖民政府长官弗雷·迭戈·德赫雷拉(Frey Diego de hereira)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谈及琉球的地理位置,“在这些岛屿(指日本)和中国之间偏东的一点是琉球群岛(Lequios)。据说他们很富有,但我们无法对他们了解太多,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去过那里,基于这个原因,我得出结论,他们一定很小,而且人们对商业不太感兴趣。”^{[9](P183)}这里对琉球群岛的描述基于西班牙的主观色彩,其结论并不一定正确,经过大量证据表明,16世纪中期的琉球已经在东亚经贸往来中崭露头角。同时在1575年胡安·帕切科·马尔多纳多(Juan Pacheco Maldonado)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提及西班牙人试图对琉球群岛进行探索和征服的内容,“如果我有足够的人员和船只,我打算派遣人员去发现日本这边的琉球群岛。这对陛下的服务非常重要,在上述五百名士兵抵达上述岛屿后,有必要立即实现其目的,即征服、定居和探索上述吕宋岛以及离中国最近的地区:日本、琉球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9](P276)}第二,提及了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整个印度,包括恒河群岛和它最著名的王国,如坎布加、通昆、日本、琉球群岛等——特别是当不少人确认中国人统治了所有这些群岛,并且认为他们是巴罗斯提到的爪哇人的第一批定居者时。”^{[10](P316)}在这段内容中,西班牙人认为琉球与中国具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认为琉球甚至处于中国的支配和统治之下。第三,提及西班牙试图派出基督教传教士前去琉球传道。在1586年胡安·德莫隆(Juan de moron)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提及“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安全,有必要安抚和统治他们,而这在以后将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做到的。这些省份包括巴[布]延斯、赫尔莫萨岛[福尔摩沙]、卡瓦洛斯岛、琉球岛、阿约岛[海南岛]、贾巴斯、伯尼、巴拉圭、卡拉米安、棉兰老岛、暹罗、马卢科和许多其他省份。”^{[11](P290)}在1640年迭戈·阿杜阿尔特(Diego aduart)这样描述琉球:“直到接近靠近日本的琉球岛,这些琉球列岛数不胜数,其中一些非常大,非常肥沃。他们的居民天生性情很好,因此,他们是异教徒,所以所有到那里去的人都感到惊奇。他们非常善良,有爱心,温顺,没有自私自利,如果信仰的幸福日子即将来临,他们将成为高尚的基督徒。”^{[12](P87)}第四,提及了日本与琉球的关系以及萨摩藩对琉球的征服,提到琉球的地理位置接近于日本,同时日本国王派遣军队对琉球群岛进行军事征服。

第五也是论述的重点,提及了琉球人在马尼拉开展贸易活动,下面就按照史料的逻辑和时间顺序来论述琉球商人在马尼拉的白银贸易。由于拉丁美洲白银汇聚马尼拉,致使前往贸易的亚洲商人或其他国家的商人前来贸易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了白银,这些商人往往会带着本国特产和东南亚特产前来交易,对此,西班牙政府也十分支持这种贸易活动。1576年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sander)在向西班牙皇帝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带来了大量的胡椒和丁香,由于墨西哥的白银和这些地区的黄金,我相信中国人更喜欢和我们交易。”^{[13](P102)}当时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亚洲的竞争关系,致使双方都试图拉拢中国商人,然后西班牙认为自己能够在这次竞争中成功的关键在于马尼拉有丰富的白银和黄金储藏。在马尼拉的贸易活动中,琉球商人也加入其中。在安东尼奥·皮加菲塔(Antonio pigafita)的《第一次环球旅行》(1519—1522)中这样记述琉球商人的活动,当1521年5月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棉兰老岛时,受到了当地国王的热情招待,安东尼奥·皮加菲塔记载道在这里有一个港口,有着丰富的资源,从那里到西北部需要两天的路程,可以看到一个叫吕宋(Lozon)(现指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岛,每年有六八艘属于琉球人(the Lequian people)的帆船前往贸易^{[14](P207)}从中可以看出琉球人最早在1521年之前即在16世纪初期便与马尼拉建立了贸易关系。另外一则史料则证明了琉球商人在与马尼拉展开贸易时,除了进行双方产品交换,也参与了马尼拉白银贸易。“1640年1月初一艘飞机失事坠落在南海的礁石上,飞行员胡安·贝尔纳多·德·富恩蒂杜涅斯(Juan Bernardo de Fuentidueñas)高烧。为了求得生存,在黎明时分,西班牙人探索礁石时发现了一艘外观看起来像中国帆船的船只,这艘船已经失事。当西班牙人试图进入这艘船以寻求小船来逃离这里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船上空无一人,但是他们发现有大量的白银散落其中,他们不满足于此,于是多次潜入周围海域试图发现更多。经过他们多次探索,他们终于在小高地的顶部发现了一个小岛,周长不超过1勒瓜。他们乘小船一次又一次地去了那里,发现了三个在那里呆了几个月的琉球人,他们是离开他们国家的十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船失事)。在这个岛上,西班牙人尽可能地改装了他们的船和另一艘琉球人手边的船,尽管它也很小,他们分乘两艘船,尽可能多地带着白银出发前往澳门。”^{[15](P131)}通过史料可知琉球商人在南海海域之上往来中国与马尼拉进行白银贸易时,由于船只故障,导致琉球

人被困于岛礁上,随后被西班牙人拯救后随之一同前往澳门进行白银交易。同时也有一则史料暗示了上述琉球船只的确前往马尼拉展开白银贸易,并将所得白银运回中国的事实。“在1640年不久,一艘船只再次在往来中国—马尼拉途中失事,一个被派往搜救的飞行员说他们是为了寻找那艘在五天前离开澳门前往马尼拉的船,飞行员本人在几天后返回马尼拉,根据他对事件的叙述,他被派去当那艘船的领航员,去寻找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在途中,也许他会再次寻找暗礁或中国船只,以便获得它所拥有的资金。”^{[15](P132)}由此可见从中国—马尼拉路途过程中,商船失事的几率并不算小,其商船上往往带有一定的白银。

从上述得知,琉球商人不仅参与了马尼拉的白银贸易而且通过南海将所得白银运回中国。同时更重要的一点,通过整理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琉球商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情况即中国福州—棉兰老岛—吕宋(马尼拉),返航时目的地为福州或因风浪转达中国澳门。值得令人振奋的一点,作为琉球国古籍的《历代宝案》中竟没有记载琉球与吕宋(马尼拉)所开展贸易的史料,这曾一度使得干扰过琉球对外贸易尤其是琉球南下贸易路线的研究,但在《菲律宾群岛史》中却可以发现足以证明琉球曾与马尼拉进行贸易的记录,这个史料的发现不仅证明两者贸易发生的时间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到琉球商人是如何参与到美洲白银的区域贸易中的。

从以上史料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西班牙人眼中的琉球印象,更可以得知琉球商人在马尼拉所从事的白银贸易的相关内容。琉球商人凭借着自身的航海优势,实现了一个从事国家转运贸易者到白银运输者的角色转变。在南海海域之上,琉球商人作为白银的承载者将美洲白银运回中国,使得部分海外白银得以流入中国,这种角色的演变也使得琉球商人在东亚海域的贸易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力得以多样化,这种转变不一定是琉球商人开展中介贸易活动的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初衷。

三、琉球商人的中日贸易与日本本土白银内流

琉球商人凭借着邻近日本的地理位置和与中国的朝贡关系进行中日中介贸易之时,使用日本本土白银大量购买中国货物,从而使日本白银有了另外一条流入中国的渠道。明朝后期,日本的银矿得到大规模开采和利用,日本的白银储量到达高峰,“在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是今岛根县的大森矿山,兵库县的生野银矿,还有佐渡相川(今新潟县)、羽后院

内等银矿”。^{[6](P38)}白银的大量生产和中日贸易的巨大利润使得商人们垂涎欲滴。然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事件的爆发,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从此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此后虽然明朝隆庆初年(1567—1572)开海贸易,却始终对日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仍有一部分商人为追逐中日贸易的巨大利润违反禁令,中国商人暗中进行中日贸易这种行为使得一部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在中日之间进行贸易时,日本主要用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商人便将日本本土白银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然而,在日本白银的转运中,不只有中国商人的身影,还有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加入到了日本白银贸易中来。自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澳门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贸易据点,在此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于是当葡萄牙人参与到日本白银贸易中时,他们通过日本港口城市长崎将白银转运至澳门,从那里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然后将他们获得的一部分中国商品又转卖到日本,从中获取巨大利润。荷兰人的贸易据点则在台湾岛,其中一部分日本白银便通过荷兰人之手经由台湾岛运至中国。可以从中看到日本白银贸易的范围波及了整个东海海域,无论是中国台湾抑或是澳门均不能避免,同时参与日本白银贸易的商人群体更是复杂。

然而,作为濒临日本且与其有特殊关系的琉球自然也牵涉其中,琉球商人和其他商人一起作为日本白银的载体,使其流入中国。英国学者威廉·阿特威尔(William Atwell)便曾提出,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日本白银通过转运的方式先流向琉球群岛、澳门地区、台湾地区、高丽和东南亚等地区再经由这些地区的商人带往中国。^[16]因此一部分流向琉球群岛的日本白银经由琉球商人之手转运至中国,从而推动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步伐。

琉球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但同时因为中日琉三方复杂的政治关系也使双方的经济关系变得不再纯粹。在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早在应永二十二年(1415年)便与日本有了贸易往来。琉球商人定时前往日本进行贸易,将所得中国特产如甘草等物在其市场进行售卖,并在日本买取刀、扇、砂金和铜等物带往中国。^{[17](P70)}此时的日琉双方在经济地位上平等,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日琉双方经济上的平等部分得益于日中贸易的顺利开展,琉球虽然在对中贸易过程中获益颇多但此时并非为日本所窥视,而1523年中日贸易的停止成为日本侵略琉球的催化剂。日本为了再次攫取对中贸易利润,

便顺理成章地将目光投向知之甚多的琉球,幕府方面试图通过琉球来重启中日贸易或攫取其中所得利润。“岛津氏有试图通过琉球重启对明通交的企图,随后在庆长十五年闰二月十日日本多正纯向岛津家久的信中便提及了这一企图,并希望派遣少数人马赶赴明朝。”^{[18](P586)}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从此日琉双方的平等地位改变,这次入侵使得琉球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日本军队对占领后的琉球王国进行杀烧抢掠,琉球国长期经对外贸易所累积的财富也被一抢而空。由于此时中国对日本实行海禁,中日之间无法正常进行交易。为了谋取更大的贸易利润,日本便决定利用琉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进行贸易,因此原本独立的琉中贸易也被日本所暗自控制。

从此,琉球的朝贡贸易所需资金均由萨摩藩出资即用日本白银来购买中国货物,而所购买的中国货物也由萨摩藩统一处理,这就形成了缺少日本的资助琉球便无法前来中国贸易的困境,但这也意味着日本的白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转移到了中国,从此真正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序幕。关于明朝琉球的白银贸易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09年至1633年、1634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指萨摩藩入侵琉球到琉球国王尚丰王的册封,再到2年1贡的恢复。第二个阶段是1633年、1634年到1644年、1645年、1646年,这一阶段是以册封尚丰王为契机,从恢复2年1贡到明王朝灭亡及南明政权瓦解为止。^[19]在第一阶段中,为了获取中国产品,琉球在萨摩藩的强力支配下使用日本白银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贸易的物品多为中国生丝。据西班牙人所描述,琉球通过经营中日之间的丝银贸易而变得富有,^{[1](P98)}在此之后琉球古籍《历代宝案》中便多次提及琉球商人与中国的生丝贸易。

在崇祯七年(1634年)发生的一起福州商欠案也于此相呼应。琉球国中山王府三法司马胜连、毛泰运、吴呈瑞于崇祯七年来中国进贡,托福州私商代购湖丝4594斤,交付白银4998两,但是商人并没有交付货物,因此琉球商人特向官府投诉来追回货物,在投诉状中写明了每个中国商人所欠白银和应交付的生丝数量,“须至申者计开林泰:银七百二十一两二钱五分,该丝六百六十三斤;何六:银五百二十一两正,该丝四百七十八斤;冯敬:银四百五十四两七钱八分,该丝四百八十斤;冯鼎:银五百二十两八分,该丝四百七十斤八两;梁迹:银四百五十二两六钱,该丝四百六十斤;方春:银三百二十一两,该丝二百九十四斤等”。^{[20](P655)}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琉球商人以购买生丝的方式将一部

分日本白银带往中国。在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其区别在于贡期的恢复。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下,琉球国与其他朝贡国一样按照明政府的规定定期朝贡,但明廷显然优待琉球。在明洪武年间,琉球国朝贡频繁,不仅一年一贡,甚至一年多贡。随着琉球商人多次破坏朝贡规定,明朝遂要求琉球一年两贡。而随着1609年萨摩藩入侵,明廷因担心琉球被日本控制,于是在1612年下令其十年一贡。贡期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琉球的朝贡贸易活动,也从而影响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步伐。为了更好获取对明贸易利润,琉球使臣开始不断请求明朝恢复贡期,但始终没有成功。例如在1613年便发生了琉球使臣不顾明朝禁令前来朝贡的事件,“又明年再贡,福建守臣遵朝命却还之,其使臣怏怏而去”。^[21]《卷323琉球传》其后琉球贡期又经历了1623年的五年一贡时期,而此时贡期又重新恢复为两年一贡,这使得琉球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前往中国进行贸易,频繁的贸易活动带动了更多日本白银的流入。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就发生了一起福建商人骗取琉球商人贸易银两的事件“何荣、梁迹、冯光、蔡清欠银贰仟两正,冯季鼎欠银五百两正。”^[20](P667) 以上的商欠案可以看出琉球商人曾携带大量日本白银前往中国购买生丝,一部分日本白银借此途径得以输入中国。

萨摩藩的入侵给琉球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使得琉球王国深受日本的压迫,而琉球的日本白银贸易也在此时真正开始发端。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其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使琉球成为了重启中日贸易的媒介。在琉球朝贡贸易的掩护之下,日本暗中用白银购买中国产品,这种行为导致了日本白银搭载着琉球商船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琉球商人也就因此成为了日本白银的载体,加速了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步伐,琉球商人顺应历史的大趋势在日本白银内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纳入到了东亚日本白银贸易活动中,为东亚白银的流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种贵金属的白银被世界各地人们接受之后,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结算的重要角色。明代的中國凭借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大量向外吸收白银,这刺激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涌入中国。随着美洲白银的东来和日本本土白银西进,整个东亚成为了世界白银的“聚宝盆”。大量白银在东亚的流动使得东亚白银货币圈的形成已成必然。在此货币圈内部,无论是作为美洲白银运输者的欧洲商人—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人亦或者

是亚洲本土商人—日本、琉球等商人群体都纷纷投身于东亚白银贸易之中,他们的存在使得海外白银能够以一种迅速而简便的方式流入中国,但在这些商人群体中有一个特殊的存在—琉球商人。如果说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被困于明朝海禁政策而难以自拔,西班牙商人由于《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签订而身陷囹圄,那么琉球所从事的白银贸易就显得独具特色与优势了。第一,琉球凭借与中国的紧密朝贡关系,往来中国海域不受束缚,可以用所获得中国特产和东南亚商品前往马尼拉进行交易,以换取白银,再将白银运至中国。第二,琉球濒临日本,到萨摩藩入侵之后日本白银的流入更是受到日本官方支持。第三,也是琉球商人自身所区别于其他欧洲商人的最大特点即琉球商人在白银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为白银的转运者,而非欧洲商人白银给予者的身份,且琉球从事白银贸易最终目的并非为了获得中国商品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这与欧洲人从事白银交易的目的显然不同,琉球商人希望能够通过此贸易最终盈利,其最终是为了利而非物。这三点体现了琉球商人群体与其他商人群体相比所具备的独特之处。在此优势之下琉球不仅满足了自身对财富的渴求,又促进了海外白银的内流,无论对中国亦或者琉球而言,在某种程度上都实现了双赢。在东亚白银货币圈中,琉球在与中菲开展中介贸易时,除了进行产品交换同时也进行白银贸易,将部分马尼拉的美洲白银运至中国。在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后,日本躲在琉球背后借琉球朝贡之名暗中进行中日贸易。在这之下,琉球商人在使用日本白银购买中国货物之时,日本白银早已悄然流入中国。综上所述,琉球商人在明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大背景之下为其白银的输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斗转星移在18世纪中后期,由于琉球中介贸易的衰落和日本白银出口数量的锐减,中国反而成为了白银的输出国,琉球商人也便不在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了。

参考文献:

- [1] [日]滨下武志.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M]. 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2] 谢必震. 明清中琉航海贸易研究[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4—9.
- [3] 谢必震. 试论明代琉球中介贸易[J]. 南洋问题,1986(1):17—26.
- [4] [明]陈侃. 使琉球录[M].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明嘉靖刻本影印. (下转第74页)

推陈出新,在大数据背景下红色旅游用户画像整体构建流程,主要依托于大数据平台,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业务流程系统,且融合了多方业务数据来源。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红色旅游用户画像体系,从数据层面到产品层面,不断提供更加精准的标签管理、算法及业务管理内容,能够为红色旅游地区发展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实际上,大数据平台与红色旅游用户画像的融合,从API接口服务输送到各个业务方,增加数据服务人员范围,描述用户量化特征,能够推动红色旅游更深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Z]. 2004.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Z]. 2011.
- [3] 曹智,李大伟. 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 经济日报,2014—12—16(16).
- [4] 许庆勇,江顺亮,段隆振. 红色旅游专题数据库共建共享机制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4,(17):56—59.
- [5] 廖丽华. 以数据驱动为导向的湖南红色旅游资源数据库建设[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21,(16):44—46.
- [6] Alan Cooper. About Face 3 交互设计精髓[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 [7] 洪霞芳,黄灵光. 基于GIS的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以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为例[J]. 企业经济,2022,41(2):125—131.
- [8] 林雅情,甘萌雨,卢嘉新. 福建省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台湾农业探索,2020,(2):70—75.
- [9] 王钊,黄文杰. 长征红色旅游景区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经济地理,2021,41(11):209—217.
- [10] 李伯华,谭红日,杨馥端,等. 红色旅游资源数字化保护:理论认知与技术路径[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22,38(2):135—141+256.
- [11] 明神宗实录[M].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壬寅条,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 [12] [日]松浦章. 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M]. 张新艺,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 [13]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IV,1576—1582,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4.
- [14]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XXIII,1519—1522,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13.
- [15]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VII,1609—1616,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5.
- [16] [英]威廉·阿特威尔. 国际白银流动与中国明朝后期的经济[J]. 阙岳南,译.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1):25—33.
- [17] [日]宫城荣昌. 琉球的历史[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
- [18] 鹿儿岛県史(卷2)[M]. 东京:近藤出版社,1974.
- [19] [日]梅木哲人. 「薩摩藩の白銀貿易」と白銀の問題について: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12—23.
- [20] 历代宝案(琉球国古籍):第一集(卷40)[M]. 台北:台湾大学,1972.
- [21] 明史[M]. 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责任编辑:王 晴)

(上接第69页)

- [5] 明神宗实录[M].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壬寅条,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 [6] [日]松浦章. 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M]. 张新艺,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 [7] 曹洁. 论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白银生产[D]. 河北:河北大学,2010.
- [8] [英]Stanley J. Stein, Barbara H. Stein. *Silver, Trade and War: Spain and America in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urope*[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2000.
- [9]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III,1569—1576,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4.
- [10]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L,1690—1691,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9.
- [11]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VI,1583—1588,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4.
- [12]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XXII,1640,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13.
- [13]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IV,1576—1582,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4.
- [14]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XXIII,1519—1522,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13.
- [15] [美]Emma Helen Blair. *The Philippine Islands*[M]. 1493—1803 Volume XVII,1609—1616,G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2005.
- [16] [英]威廉·阿特威尔. 国际白银流动与中国明朝后期的经济[J]. 阙岳南,译.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3(1):25—33.
- [17] [日]宫城荣昌. 琉球的历史[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7.
- [18] 鹿儿岛県史(卷2)[M]. 东京:近藤出版社,1974.
- [19] [日]梅木哲人. 「薩摩藩の白銀貿易」と白銀の問題について: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12—23.
- [20] 历代宝案(琉球国古籍):第一集(卷40)[M]. 台北:台湾大学,1972.
- [21] 明史[M]. 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责任编辑:周 淳)